读史札记

金川土司与西藏关系考

张　闶

乾隆十二至十四年（1747–1749）和乾隆三十六至四十一年（1771–1776），乾隆帝两次发动对四川省西北部大小金川土司的战争，最终将其平定。这两场战争是乾隆帝“十全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因其丰富的内涵而备受关注，已经有了不少学术成果。① 然而，就金川土司与西藏关系这一问题而言，学界研究尚不深入。这主要是因为，汉文史料对该问题的记载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汇集乾隆帝有关第二次金川战争上谕的专档《金川档》中只有一些不成系统的记载，战争结束后为颂扬乾隆帝武功而纂辑的专书《平定两金川方略》的相关记载更是寥寥。② 最近，邹立波在其新著《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一书中，以藏文史料为核心，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清朝时期嘉绒地区佛教与苯教的关系，大大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③

乾隆帝十分重视处理金川土司事务，在两次战争前后形成了大量档案文书，主要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仅满文档案的数量就有上千件，绝大部分尚未公开出版。本文选取其中数件相关的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寄信档，并结合汉、藏文献，对金川土司与西藏关系的问题展开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满文档案所见金川土司与西藏关系

大小金川土司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和小金县，地处青藏高原的东缘，和西藏相距甚远。众所周知，两金川土司崇信苯教，而西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两种宗教存在差异乃至一定程度的冲突。然而，就满文档案揭示的事实看，尽管金川土司距离西藏遥远，且信仰的宗教有所不同，双方宗教联系却是非常密切。

乾隆二十五年，金川老土司莎罗奔去世。一年以后，其侄郎卡请求清朝官员将其父亲德尔

[收稿日期]　2020-04-13
[作者简介]　张闶（1991 —），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2；zhangkang91@126. com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 68 批面上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2020M680796。

① 研究现状主要可参考徐法言：《乾隆朝金川战役研究评述》，《清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曾现江：《嘉绒研究综述》，《西藏研究》2004 第 2 期；叶小琴：《近六十年来嘉绒十八土司研究综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邹立波：《国外嘉绒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思想战线》2014 年第 4 期等文章。

② 近年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为徐法言：《走出“佛苯之争”的迷思——论第二次金川战役前金川地区苯教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12 年第 3 期；徐法言：《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过程之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他为突破传统的“佛教 – 苯教”冲突模式作了有益尝试，但由于资料的限制，部分论证尚有待深入。

③ 邹立波：《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10–129 页。

日嘉勒、叔父莎罗奔骨殖带至西藏，制作灵塔，安放于后藏杰隆地方之奔布尔喇嘛庙，并同时提出派遣喇嘛十二名赴曼日寺、达尔顶寺学经。时任四川总督开泰为其颁发火票，派遣把总沿路护送。至藏后，驻藏大臣集福、傅鼐令噶布伦等查例应如何办理。噶布伦等禀呈：

> 先前杂谷（dzagu）、革什咱（gešidza）等部众人曾数度来藏，于后藏之曼日（mairi）寺、达尔顶（darting）寺等寺庙居住学经。金川土司之人，先前虽不曾来藏，今此辈愿诚心驻藏学经，似不便立即遣回。将此亦告知第穆呼图克图。①

噶布伦等的禀呈说明，嘉绒地区杂谷、革什咱等土司曾几次派遣人员赴藏学经，足证嘉绒与西藏宗教往来的密切。不过关于“金川土司之人，先前虽不曾来藏”的记载却并不准确。首先，金川与杂谷、革什咱等都是嘉绒十八土司的组成部分，地理相近，文化相同，金川土司更是热衷编纂苯教《大藏经》。如果杂谷、革什咱等土司屡次赴藏，而金川土司却置之度外，这与情理不合。其次，此后的清朝档案可以证明，在乾隆二十五至四十年间，金川土司多次遣人赴藏，如果之前不曾来藏，何以这十余年联系突然变密切了？最后，在查获的金川喇嘛供单中，已有喇嘛在藏时间达二十六年之久，显然系乾隆十几年时就已赴藏。故金川土司与西藏早有往来，只是彼时未能引起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而已。

此时，嘉绒地区局势较为稳定，故驻藏大臣等依照噶布伦等禀呈，将金川俄木布喇扎延噶西（ombu r’ajayan g’asi）等六名喇嘛及六名随从喇嘛，于曼日寺、达尔顶寺等寺庙安置下来。

乾隆三十五年，郎卡去世，其子索诺木又请求清朝官员将郎卡之骨殖送往后藏地方，制作灵塔，并同时提出派遣十二人赴后藏熬茶。两次请求间隔十年，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四川总督阿尔泰照例为其颁发火票。然而，乾隆三十六年清军已同小金川土司交战，故阿尔泰行文驻藏大臣：“现正办理金川事务，土司索诺木派遣赴藏熬茶之人，不便令其在藏久留，亦断不可遣回原地。此辈人等，应派出官兵照看，解送至打箭炉另行处理。”② 驻藏大臣莽古赉便派人将十一人（一人途中病故）解送至打箭炉。不过，将军温福为行军安全，又令将其一行解送至成都。③

十年之间，两任金川土司（及其亲族成员）过世后，其骨殖都要安放于后藏，并派人学经、熬茶，这足见后藏在土司心中的重要地位。除了土司去世这种重要场合以外，平时两金川也多有零星派遣喇嘛赴藏。乾隆四十年，第二次金川战争进入尾声之时，乾隆帝寄信驻藏大臣伍弥泰、副都统恒秀等人，要求搜查所有在藏的两金川喇嘛。经过一番排查，伍弥泰等共查出三十一名两金川喇嘛，经过详细讯问后，录了详细的口供。如曼日寺查获的纳木达克鄂布喇嘛在藏已九年，三十九族查获的察衮喇嘛在藏已二十六年，索诺木鄂泽尔喇嘛在藏已十七年，阿木达克鄂泽尔喇嘛在藏两年。其余各喇嘛，在藏数年至十余年、二十余年不等。④ 乾隆帝对此十分重视，并要求特别注意为金川土司索诺木所敬信的丁扎木等四位喇嘛，“若实有助贼作恶之处，立即从重治罪，不可宽免。”⑤ 按察衮喇嘛在藏二十六年，则他于乾隆十四年左右就已赴藏，那时正值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之时；索诺木鄂泽尔喇嘛在藏十七年，则他于乾隆二十三年左右就已赴藏；纳木达克鄂布喇嘛在藏九年，则他于乾隆三十一年左右就已赴藏；阿木达克鄂泽尔

---

① 《驻藏大臣集福等奏金川派十二名喇嘛赴藏学经折》，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179-1922-016。以下所引未刊档案，均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再一一注明。

② 《驻藏大臣莽古赉奏派兵护送金川赴藏熬茶头人返回打箭炉折》，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4-2432-032。

③ 《温福奏遵旨派人护送金川土司索诺木派往西藏熬茶之人至打箭炉折》，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5-2492-003。

④ 《驻藏大臣伍弥泰奏将在藏所有大小金川地方喇嘛查送京师折》，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7-2662-001。

⑤ 《寄信定西将军阿桂等为查拿大小金川地方喇嘛嘎赉等治罪事》，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7-2663-051。

喇嘛在藏两年，说明即使是第二次金川战争时期，金川土司仍在派人去西藏。除了学经以外，两金川还派遣人员赴藏学习医药等项。如小金川土司泽旺因本地没有医生，派遣达邦赴藏学医，并给与银两。达邦“到了藏里，在第穆胡土克图地方学了六年医”。①

从上述档案列举的事实来看，两金川土司频繁派遣喇嘛等人员入藏，这说明金川土司与西藏的联系是密切的、长期的、多批次的。西藏在土司心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金川土司与西藏联系密切的原因

通过满文档案披露的史实，可以得知金川土司与西藏的宗教、政治等联系非常密切，而这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明万历六年（1578），索南嘉措通过与蒙古俺答汗的会晤，获得了达赖喇嘛的称号。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接受了顺治帝的册封，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不局限于西藏，而是波及整个藏地，其中就包括嘉绒地区。兹以《五世达赖喇嘛传》和《七世达赖喇嘛传》为例，列举一些达赖喇嘛参与处理苯教事务和嘉绒藏区事务的记载。

《五世达赖喇嘛传》火马年（1666）二月记载：“当时，曲杰帕邦喀巴和澎波色康寺苯教寺院的几位僧人恳请我结合祈愿做一让喜饶卓玛妇人百劫永生的承诺，并提出让车臣温布翻译，为了照顾情面，我答应了。”铁狗年（1670）七月记载：“为了期望能涌现出对此多闻勤思者，同时起到能够取悦苯教《十万白龙经》所载诸龙的作用，去年各部门已送去《五部遗教》、《十万白龙经》原本刻板，最近收到了印版。”铁猪年（1671）十一月记载：“我会见了昌都济咙仁波且活佛、苯教雍仲米久布古东伦珠、安多的几个献马者、那仓拉加布等不少人。”木虎年（1674）十月记载：“我设茶宴招待了康甲莫昂喇嘛贝丹扎巴、苯教徒加瓦益希的孙子、达布扎仓的管家、林格隆罗桑彭措……喀尔喀右翼索巴伊勒登和诺木齐珲台吉的代表宰桑格隆、扎仓曲杰活佛等三百余人。”②

《七世达赖喇嘛传》水阳鼠年（1732）记载：“几位嘉绒察果寺僧人不辞艰辛，怀大信仰，前来朝拜，喇嘛为彼等摩顶。”水阴牛年（1733）新春记载：“闭关结束后，接见嘉绒察果达吉林寺的喇嘛僧徒，并授所欲之法，向父尊之侍从达吉康赛巴等赴藏僧俗授四臂观音随许法。自察果僧众来此到返回之间，喇嘛为彼等布施斋僧茶，恩赐额外奖品，做事佛法事，辞别时隆重送行。”木阳鼠年（1744）新春记载：“此后，赤钦持金刚从甘丹寺至，师徒畅谈修行觉受，接见加绒察果土司之子策旺，与之叙谈。”木阴牛年（1745）九月记载：“喇嘛接见自德格而来的司徒活佛和嘉绒察果哇女土司卓玛主仆。”木阴猪年（1755）记载：“朱倭霍尔康赛和玛素尔地界相连，双方发生争端，为平息事端、利乐地方，向当事者双方以及临近的德格、加绒绰斯甲等地派专人送去诏令，命当思不可思议之异熟，和睦相处。”③

从《五世达赖喇嘛传》和《七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对苯教事务及嘉绒地区有着巨大影响力，不仅多次接见朝拜，施茶设宴，而且直接介入土司争端，担任调停角色。两金川土司作为藏区的边缘角色，自然对达赖喇嘛所处的核心角色有着十分崇敬的心理，有着与西藏交流的强烈动力。故而，每次金川土司派遣喇嘛赴藏后，都要对达赖喇嘛等均有所贡献。小金川人达邦在学医返回时，还要专程至达赖喇嘛处告假。④

---

① 冯明珠、庄吉发编：《金川档》第1册，达邦供词，沉香亭企业社，2006年，第939页。

②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上册第428页，下册第44–45、68、159页。

③ 章嘉·若贝多杰：《七世达赖喇嘛传》，蒲文成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09、112、230–231、245、356–357页。

④ 冯明珠、庄吉发编：《金川档》第1册，达邦供词，第939页。

班禅额尔德尼在金川土司心目中的地位也相当高。众所周知，金川土司信奉苯教，嘉绒地区是苯教“大本营”。然而，遥远的西藏尽管藏传佛教占据主要地位，但苯教却并未消亡，在一些偏远地区仍有所发展。满文档案中提到的“曼日寺”和“达尔顶寺”，就是位于后藏地区的两座重要苯教寺庙。曼日寺，位于今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最初由嘉绒人西绕坚赞于明永乐三年创建，这座寺庙的特点就在于风格接近格鲁派，显示出佛苯汇流的趋势。此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该寺成为西藏一大苯教中心。① 达尔顶寺，位于今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最初由辛氏家族高僧益西罗追在 1173 年创建，此后辛氏家族尼玛坚赞进行扩建，因位于达尔顶村内，故名达尔顶寺。众所周知，雍仲苯教的创始人是辛饶弥沃，辛氏是苯教最为尊贵的姓氏，而达尔顶寺是由辛氏家族创建的，故苯教徒相信辛氏家族就是苯教创始人的后裔，所以达尔顶寺在苯教中也具有崇高地位。②

金川土司视后藏曼日寺、达尔顶寺为苯教圣地，二寺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愿不惜代价，不远千里前来学经、熬茶，把去世的先祖骨殖制为灵塔供奉于达尔顶寺。而后藏恰恰是班禅额尔德尼的辖地。为了能够顺利熬茶等，金川土司必须加强和班禅的联系。

正因如此，第二次金川战争期间，金川土司仍多次遣人赴藏。甚至在后期败局已定时，还派遣喇嘛达固拉僧格赴藏，带着给达赖喇嘛、第穆呼图克图等人的书信及达赖喇嘛此前颁给的印信执照，幻想请求达赖喇嘛等代为向乾隆帝求饶。在途中被擒获后供称：“索诺木等屡次所具禀帖，将军们总不见回覆，想西藏活佛可在大皇帝前代为讨饶，故写三封书信，派我前去恳求。”③ 只是在当时的情形下，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也不敢违背乾隆帝的意志，不但不能帮助金川土司，还要在前后藏“聚集喇嘛四万余众，讽经百日，以彰天讨”。④ 在中央强力的政治和军事介入下，金川土司和西藏的宗教纽带不可避免被大大削弱，未能发挥金川土司期待的调停作用。

当然，派遣喇嘛赴藏学经，对土司本人也有好处。由于路途遥远，金川本地喇嘛去西藏学经的机会自然稀缺。因此，土司必定会派遣自己最为信任的喇嘛赴藏，待学成返回之后委以重任，这些喇嘛自然愿为土司服务，有助于提高土司本人的权威。郎卡和索诺木就对苯教喇嘛特别敬重，不但使金川本地的喇嘛甘愿效力，连革布什咱等周边土司的喇嘛也多有慕名而来者。例如，都甲喇嘛雍中泽旺，十岁就在舍齐寺出家，在西藏学习过十三四年，后在金川思都甲沟庙里当喇嘛。索诺木待他非常好，常令他跟随左右。⑤ 这些喇嘛也对他“投桃报李”，在战争期间频繁施以“扎答”法术，向上天祈求雨雪，阻碍清军前进，令清军人心惶惶。

三、乾隆帝对双方关系的应对举措

上文已经指出，金川与西藏的关系由来已久，但此前并未引起清廷足够的重视。乾隆二三十年代，两代金川土司去世后，请求赴藏安放骨殖及派人学经，清廷均例行公事般给与火票，并未过多干预。战争前期，清军对两金川土司内部状况及金川土司与西藏的关系仍知之甚少。直到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清军才终于知晓两金川“贼人全不崇信黄教，亦非红帽教，而是崇信一种奔布尔邪教（cucin. dzanla i hūlhasa umai suwayan šajin be wesihulerakū bime. inu fulgiyan

① 才让太、顿珠拉杰:《苯教史纲要》，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85–188 页。

② 才让太、顿珠拉杰:《苯教史纲要》，第 294–295 页。

③《平定两金川方略》卷 120，乾隆四十年六月丙申。

④《平定两金川方略》卷 85，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丙辰。

⑤ 冯明珠、庄吉发编:《金川档》第 6 册，“都甲喇嘛供词”，第 4427 页。

mahala tacihiyan waka. encu emu bumbur sere miosihon tacihiyan be wesihulembi.)。”[①] 也就是说，到战争中期清军才摸清楚金川土司的苯教信仰。随着对金川土司与西藏关系了解的深入，乾隆帝对此十分担忧，他担心金川与西藏声息相通，影响战争进程，危及藏地稳定。这影响到乾隆帝在战中和战后的一系列安排决策。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将军阿桂等获得了索诺木家族骨殖安放在达尔顶寺的情报，向乾隆帝奏请将伊等骨殖进行处理：

> 奴才等思量，德尔日嘉勒、莎罗奔、郎卡之骨殖若已制为灵塔，断不可继续留于奔布尔庙中供献，须抛撒骨殖，以绝根株。恳请降旨驻藏大臣伍弥泰、恒秀，令伊等密问第穆呼图克图、噶布伦，将藏于奔布尔喇嘛庙内之德尔日嘉勒、莎罗奔、郎卡之骨殖灵塔俱行查出，于甚为污秽之地，锉骨扬灰。如此办理，方可彰国家法度，大快众心，贼人索诺木之根本亦将扫除净尽。[②]

阿桂等的这一建议自有来由。金川番兵对土司非常敬信，土司在他们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莎罗奔、郎卡不但是现任土司索诺木的叔祖父、父亲，也曾是金川老土司，他们逝世不过十数年，仍为多数番人熟知。土司索诺木把家族骨殖敬奉于达尔顶寺，主要是出于达尔顶寺在苯教信仰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将其“锉骨扬灰”，将在心理上沉重打击金川土司和民众，很可能会动摇其继续抵抗的决心。但此时的乾隆帝更愿意看到的是清军直捣官寨获胜，所以当他获知这一消息后，当即明确表示：“今我等功成，非因恃此。”加之达尔顶寺又位于后藏班禅额尔德尼辖地，乾隆帝不愿因此惊动班禅，影响藏务的处理，所以在一年之后清军攻克金川官寨勒乌围即将获胜之时，才命令伍弥泰、恒秀低调销毁郎卡夫妇的灵塔。[③] 在销毁之后，主办此事的恒秀在奏报时未提及班禅的态度，为乾隆帝所申饬：“恒秀到彼，将郎卡夫妇灵塔事办讫，且不能不见班禅额尔德尼。伊见班禅额尔德尼时，班禅额尔德尼有何话，如何言之，亦应奏闻，为何一句未及提及？恒秀又犯糊涂。恒秀著传谕申饬。”[④] 说明乾隆帝十分在意班禅的态度，不愿此事的处理影响到后藏的稳定。

战争行将结束时，乾隆帝开始筹备善后事宜，大体可分为设立成都将军，改土为屯，废苯兴黄和土司朝觐四个方面。其中废苯兴黄和土司朝觐两项举措都与乾隆帝忌惮金川土司与西藏关系有关。

乾隆帝对苯教在金川的影响十分忌惮，多次指斥为邪教，要求在两金川地区革除苯教，弘扬藏传佛教格鲁派，把金川苯教的根本道场雍仲拉顶寺更名为“广法寺”，改宗黄教。在选择堪布喇嘛时，又经过一番斟酌。阿桂曾建议令达赖喇嘛遴选喇嘛赴金川担任广法寺堪布，但乾隆帝却认为此举“恐日久金川与西藏联为一气，亦难保其不滋流弊”。[⑤] 乾隆帝最终决定从京师选派喇嘛赴广法寺担任堪布。

金川土司多次遣人赴藏学经、熬茶、学医等，说明西藏对金川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尽管金川土司已经平定，但周边绰斯甲布、革布什咱等土司同样和西藏有密切联系，这是清廷绝不愿

---

① 《阿桂奏为促浸贼信邪教若招集喇嘛念经定可破贼事》，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6-2569-023。需要说明的是，该档案是清军明确知道金川信仰苯教（即“奔布尔邪教”），且知道苯教不同于黄教、红教的最早记载，比《平定两金川方略》等汉文记载早一年多时间。

② 《阿桂等奏交付驻藏大臣掘金川头目索诺木祖坟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档案号：03-0186-2610-029。

③ 《伍弥泰等奏报遵旨前往后藏达尔顶寺拆毁金川索诺木祖父等人灵塔情形折》，乾隆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7-2658-001。

④ 《寄谕驻藏办事副都统衔恒秀著奏闻后藏见班禅额尔德尼有何言》，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一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11 册，岳麓书社，2011 年，满文部分为第 605-606 页，汉译文部分为第 765 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⑤ 《平定两金川方略》卷 108，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午。

看到的。故而设立土司朝觐制度，令土司分班定期进京朝觐皇帝，以密切他们和清廷的关系。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战争刚结束不久，乾隆帝就仿照回疆伯克之例，命嘉绒八土司启程进京，正式开始了土司朝觐制度。乾隆四十五年是乾隆帝七十大寿，六世班禅以祝寿为名觐见，所以此次嘉绒土司朝觐也格外隆重，成都将军特成额等做了周密安排。乾隆四十七年开始，对嘉绒土司朝觐进一步规范化，将其分为两班轮流朝觐，并将年班的期限调整为三年一次，一直坚持到清末。土司朝觐密切了嘉绒土司同清廷及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保障嘉绒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①

总而言之，乾隆帝既不愿金川土司通过与西藏的联系加强自身权威，更不愿双方在交往过程中会对西藏局势产生不利影响，还提防达赖喇嘛等借此机会在嘉绒地区扩展势力。他的“销毁灵塔”“废苯兴黄”“土司朝觐”等举措，都是针对此而来。以往论著在论及战争善后举措时，往往就事论事，对乾隆帝这些举措背后的考量着墨不多。乾隆帝从巩固统治、稳定边陲的角度出发，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目的就是弱化嘉绒藏区与西藏之间的关联，这客观上符合了清朝大一统政权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需要，有利于西南地区的长治久安。

---

① 张圆：《清代四川土司“年班”制度初探》，苍铭主编：《民族史研究》第 9 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03–231 页。

启 事

《清史研究》是目前国内唯一断代史专业学术期刊，自 1979 年创刊以来，始终致力于促进清史学科建设与发展，力求反映世界范围内清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在国内外清史学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本世纪初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清史业已成为中国各断代史中较为繁荣的一个分支，研究队伍日渐扩大，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为更好地反映清史研究现状，提升新时代清史研究的整体水平，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自 2020 年起，《清史研究》由季刊变更为双月刊。

我们热诚盼望学术界一如既往地支持本刊，欢迎学术界同仁积极向本刊惠赐佳作！敬请访问《清史研究》网站，使用在线投稿系统：http://qsyj.iqh.net.cn。

《清史研究》编辑部

2021 年 5 月